中国文学编年史

现代卷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於可训　叶立文

湖南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文学编年史

现代卷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於可训　叶立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编年史. 现代卷 / 陈文新主编；叶立文，於可训分册主编.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9
ISBN 7-5438-4556-3

Ⅰ.中… Ⅱ.①陈…②叶…③於… Ⅲ.①文学史—编年史—中国—现代 Ⅳ.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1971 号

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

责任编辑：李建国　胡如虹　曹有鹏
　　聂双武　邓胜文　张志红　杨　纯
主　　编：陈文新
书名题字：卢中南
装帧设计：陈　新
出　　版：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市场营销：0731-2226732
网　　址：http://www.hnppp.com
邮　　编：410005
制　　作：湖南潇湘出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　　话：0731-2229693　2229692
印　　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版　　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 1094　1/16
印　　张：38.75
字　　数：858,000
书　　号：ISBN 7-5438-4556-3/I · 459
定　　价：288.00 元

《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委员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曹道衡　傅璇琮

霍松林

主　编　陈文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石观海　李建国　汪春泓　陈文新　张思齐

张玉璞　於可训　赵伯陶　赵逵夫　胡如虹

诸葛忆兵　曹有鹏　熊治祁　熊礼汇　霍有明

本卷撰稿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立文　於可训等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

目 录

总序 …… 1
凡例 …… 1
绪论 …… 1

1912 年 …… 1
1913 年 …… 12
1914 年 …… 23
1915 年 …… 34
1916 年 …… 43
1917 年 …… 54
1918 年 …… 65
1919 年 …… 76
1920 年 …… 96
1921 年 …… 108
1922 年 …… 121
1923 年 …… 141
1924 年 …… 160
1925 年 …… 172
1926 年 …… 188
1927 年 …… 204
1928 年 …… 22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29 年 …… 237
1930 年 …… 249
1931 年 …… 260
1932 年 …… 273
1933 年 …… 284
1934 年 …… 305
1935 年 …… 321
1936 年 …… 332
1937 年 …… 357
1938 年 …… 371
1939 年 …… 392
1940 年 …… 406
1941 年 …… 426
1942 年 …… 440
1943 年 …… 457
1944 年 …… 470
1945 年 …… 486
1946 年 …… 509
1947 年 …… 525
1948 年 …… 538
1949 年 …… 552

参考文献 …… 559
人名索引 …… 567
后　记 …… 581

总　序

纪传体、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两种主要体裁，而编年体的写作远较纪传体薄弱。《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小序已明确指出这一事实："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荀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①] 与古代历史著作的这种体裁格局相似，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也是纪传体一枝独秀，不仅在数量上已多到难以屈指，各大专院校所用的教材也通常是纪传体，这类著作的核心部分是作家传记（包括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创作成就）。编年类的著作，则虽有陆侃如、傅璇琮、曹道衡、刘跃进等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就总体而言，仍有大量空白，尤其是宋、元、明、清、现、当代部分，历时一千余年，文献浩繁，而相关成果甚少。这样一种状况，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套十八卷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出版，即旨在一定程度地改变这种状况。

文学史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展开的。纪传体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以若干个焦点（作家）为坐标，对文学史流程的把握注重大体判断。其优势在于，常能略其玄黄而取其隽逸，对时代风会的描述言简意赅，达到以少许胜多许的境界。若干重要的文学史术语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大历诗风"等，就是这种学术智慧的凝

①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4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结。但是，由于风会之说仅能言其大概，“个别”和“例外”（即使是非常重要的“个别”和“例外”）往往被忽略，不免留下遗憾。一些跨时代的作家，如李煜、刘基、张岱等人，在文学史中的时代归属与其代表作的实际创作年代也常有不吻合的情形。例如，李煜被视为南唐作家，而他最好的词写在宋初；刘基被视为明代作家，而他最好的诗、文写在元末；张岱被视为明代作家，而其代表作多写于清初。比上述情形更具普遍性的，还有下述事实：我们讲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往往以毛宗岗修订本为例；我们讲施耐庵的《水浒传》，往往以百回繁本为例；我们讲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往往以崇祯本为例。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讲的并不是作家的原著；第二，我们忽略了读者的接受情形。这类涉及风会与例外、作家时代归属与作品实际创作、传播与接受两方面的问题，以纪传体来解决，由于受到体例的限制，往往力不从心，采用编年体，解决起来就方便多了：不难依次排列，以展开具体而丰富多彩的历史流程。

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作为尝试，我们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认和选择方面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以期在充分发挥编年史长处的同时，又能尽量弥补其短处。我们的尝试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我们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现当代文学因时间周期较短，拟省略阶段，不设引言）。其二，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行”（人物活动、生平）往往得到足够重视，“言”则通常被忽略。而我们认为，在文学史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以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比如，我们考察初唐的文学，不读陈子昂的诗论，对初唐的文学史进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我们考察嘉靖年间的文学，不读唐宋派、后七子的文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观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把握。鉴于这一事实，若干作品序跋、友朋信函等，由于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我们也酌情收入。其

三，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史料，思想文化活动是我们更加关注的对象。中国文学进程是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均有显著联系，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往往更为内在，更具有全局性。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这样处理，目的是用编年的方式将中国文学进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个基础性的重大学术工程，文献的广泛调查和准确使用是做好编纂工作的首要前提。《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丛书集成》、《笔记小说大观》等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典籍，近人和今人整理出版的别集、总集，大量年谱（如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以及文、史、哲方面的编年史，均在参考范围之内，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注明，谨此一并致谢。在使用上述文献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典籍是由我们第一次标点，这一工作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前人已经整理的典籍，我们也并不直接采用，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再整理一次。这样做当然增加了工作量，但确有许多好处，若干错误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纠正的，有些错误的纠正涉及基本事实的澄清。比如，张大复《皇明昆山人物传》卷八记梁辰鱼晚年情形，有云："（梁氏）当除夕遇大雪，既寝不寐。忽令侍者遍邀诸年少，载酒放歌，绕城一匝而后就睡。曰：'天为我辈雨玉，可令俗人蹴踏之耶?'时年已七十矣。亡何，中恶，语不甚了。有老奴李用者，颇省其说，尚有注记。得岁七十有三。"一位学者将"中恶，语不甚了"标点为"中恶语，不甚了"，并就此推论说："梁辰鱼七十岁时遭遇暧昧不明的事件。""《皇明昆山人物传》的上述记载本意是为贤者讳，事实上倒很可能为统治者隐盖了迫害异己文人的一件罪行。"这就不免弄错了事实。"中恶"即突然患急病，正所谓"老健春寒秋后热"，老年人得急病是常见的情形。而"中恶语"的表述，明显不符合古人的语言习惯。再如，陈田《明诗纪事》将正德时期的傅汝舟与明末的傅汝舟混为一人，将两人的生平搅在一起，其按语云："丁戊山人诗初矜独造，晚遁荒诞，择其入格者录之，亦是幽弦孤调。山人享大年，具异才，谈佛谈仙，亦作北里中艳语。初与郑少谷游，晚乃与茅止生、卓去病、张文寺、文太青倡和，支离怪

诞，无所不有。少谷集中无是也。论者乃专谓山人刻意学少谷，何哉?”《明诗纪事》近三百万言，卓有建树，是研究明诗的必备案头书。但关于傅汝舟，陈田的确弄错了。郑善夫（1485—1523）号少谷，以学杜著称，学郑少谷的是正德年间的傅汝舟；文翔凤号太青，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与文太青等唱和的是明末的傅汝舟。两个傅汝舟之间相距约百年，陈田想当然地将二者合为一人，说他“享大年”，又说他前期学郑少谷，后期学竟陵派，曲意弥缝，令人哑然失笑。其他种种，如部分文学家辞典对作家生卒年的误注，若干点校本的断句错误等，我们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纠正。提到这些情况，不是想证明我们的水平有多高，而意在告诉读者：我们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有志于为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信赖的编年史著述。

《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得到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书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单位专家和领导，尤其是武汉大学领导的支持；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及湖南人民出版社鼎力支持编年史的编纂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陈文新

2006 年 7 月 23 日于武汉大学

凡　例

一、《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第二卷汉魏、第三卷两晋南北朝、第四卷隋唐五代（上）、第五卷隋唐五代（中）、第六卷隋唐五代（下）、第七卷宋辽金（上）、第八卷宋辽金（中）、第九卷宋辽金（下）、第十卷元代、第十一卷明前期、第十二卷明中期、第十三卷明末清初、第十四卷清前中期（上）、第十五卷清前中期（下）、第十六卷晚清、第十七卷现代、第十八卷当代。

二、编年史各卷据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划分为若干章（如无必要，或不分章）。章的标目方式是："××章　××年至××年，共××年"。关于某一阶段文学的总体评论放在该章的首年之前，如明前期卷"第一章　洪武元年至建文四年，共35年"，在章目下，"洪武元年"之前，单列明前期卷"引言"一目。关于某一时代文学的综合论述，放在卷首。如元代卷，在第一章前，单列元代文学"绪论"。

三、编年史各卷所收录内容的构架大体统一，重点包括七个方面：1. 重要文化政策；2. 对文学发展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3. 作家交往（唱和、社团活动等）；4. 作家生平事迹；5. 重要作品的创作、出版和评论；6. 争鸣（团体之间、个人之间在重要问题上的论辩等）；7. 其他。

四、叙事以纲带目，即在征引相关文献之前有一句或数句概述。如，先总叙一句"俞宪编《盛明百家诗》成书"，再征引相关序跋、著录、评议。前者为纲，后者为目，纲、目配合，旨在完整地呈现文学史事实。少量见于常用工具书的重要史实，或不必展开的文学史事实，则列纲而略目，以省篇幅。

五、公历纪年年初与中国传统纪年年末不属同一年份，如公元1899年元月1日至12月31日对应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九日，而不对应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三十日。我们采用变通的处理方法，以公历纪年，而以农历纪月，比如，凡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至十二月之内的内容均置于公元1899年下。作家生卒年，仍据公历标注，其他以此类推。现、当代文学部分，纪年、纪月均据公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六、同一年内之文学史实，按月份先后顺序排列。月份不详而仅知季度的，春季置于三月之后，夏季置于六月之后，其他以此类推。季度、月份均不详者，另设“本年”目统之。

七、一部分重要文学史实，年月不详而仅知大体时段者，在年号之末另设“××年间”目统之，如嘉靖四十五年之后另设“嘉靖年间”一目。

八、引用序跋，一般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臧懋循《唐诗所序》”。引用序跋之外的诗文等作品，一般采用“集名＋卷次＋篇名”的方式，如“《有学集》卷三一《隐湖毛君墓志铭》”，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无篇名者则省略，如“《艺苑卮言》卷三”。某作者集中所收为他人别集所作的序跋，亦采用这一方式，如“《太函集》卷二二《弇州山人四部稿序》”。引用正史，一般采用“正史名＋本传或××传”的方式，“如《明史》本传”或“《明史》李攀龙传”，不标卷次。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用全称，或简称“四库提要”，只标明卷次。如“四库提要卷一五三”。引用地方志，标明纂修年代，如“光绪《乌程县志》卷三一”。据类书转引时，注明原出处，如“《太平广记》卷二〇《阴隐客》（出《博异志》）”。引用报刊，注明年月日或卷次。

九、作者小传一般置于生年。有些作家，虽生年在上一卷，但在上一卷无文学活动，其小传酌情移入本卷首次出现时。如杨士奇，元亡时才4岁，其小传置于明前期卷，出生时只交代：“杨士奇（1365—1444）生”，不列小传。现、当代作者，因传记资料常见，相关作家小传酌情收录。

十、对于某一作家的总体评论和重要著录一般置于卒年。某作者卒年在下一卷，但在下一卷无重要文学活动，主要评论材料酌情置于本卷。如易顺鼎（1858—1920），其评论材料集中于晚清卷，不入现代卷。

十一、作家代表作一般不录原文，但收录重要评论材料，并酌情说明相关选本收录情形。

十二、需要补充交待而占用篇幅较大的文学史事实，设少量“附录”。对若干需要辨证的史实，设按语加以说明。以提供文献线索为主，不详加征引。

绪 论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

《中国新的文学运动》：欧洲近代文化，都从复兴时代演出，而这时代所复兴的，为希腊罗马的文化，是人人所公认的。我国周季文化，可与希腊罗马比拟，也经过一种烦琐哲学时期，与欧洲中古时代相埒，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发起衰，五四运动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所以对于第一个十年先作一番审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儿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呵！（蔡元培：《中国新的文学运动》，《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 1940 年版）

《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中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年修订版。）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 1917 年 1 月《新青年》第 2 卷第 5 号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而止于 1949 年 7 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仅是一个时间概念。……“现代文学”同时还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新的产物，同

时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一个发展。……“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所有的基本矛盾和革命任务并未改变，但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展开，历史已经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一方面，社会内部的各个阶级和各种矛盾比近代更显得错综复杂，另一方面，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历史条件却也渐次具备并且趋于成熟。“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正带上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时代历史的印记。

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分也是复杂多样的。新起的白话文学本身，并不是单一的产物；它是文学上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不同力量的新时期实行联合的结果，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分。资产阶级文学，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的思想因素，不仅同无产阶级文学有质的不同，而且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也有很大的区别。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在文学上的代表，反封建时固然极为软弱，同帝国主义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斗争深入之后，很快倒戈成为反动势力的维护者。此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还有若干其他的文学成分。封建旧文学虽已遭到沉重的打击，但远未绝迹；鸳鸯蝴蝶派作品则改穿起了白话的衣装，在市民阶层中有所流传；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政策在文学上的产物，30 年代以及稍后一个时期，还曾出现过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所谓“戡乱文学”——这些都是文学上的逆流。现代文学里各种成分的纷然杂陈和相互斗争，正推进了文学上不同力量之消长，显示了错综复杂的情势。（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我们所说的新文学，实质上就是指的那种符合于中国人民的革命利益、反帝反封建、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且是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地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的文学。（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期

《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到现在，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是 1919 到 1927 年，相当于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所分的第一、第二两时期；第二时期是 1927 年到 1937 年的十年，相当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第三时期；第三时期是 1937 年到 1942 年的五年，即从抗战开始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抗战期间前五年的文学；第四时期是 1942 年到 1949 年的七年。即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

现代文学各个分期的文学成就：第一时期是 1919 年到 1927 年，相当于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所分的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五四”初期，还没有纯粹文艺性质的社团和期刊，许多主张都发表在《新青年》上，然而从全体看来，《新青年》到底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批判的刊物，它也注重文学，但主要是为了反封建而攻击旧文艺，这正和为了反封建而攻击旧礼教一样；因此不可能有更多的力量和篇幅来照顾到文学，

尤其是创作。所以在1919年到1921年的两年中，就文学史说，就值不得分为一个独立的时期。1921年在政治领域里的大事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第一次分化，激进的革命知识分子更激进了，而温和改良一派的则趋于和封建势力及帝国主义势力妥协。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可以说是承继和发展了《新青年》（“五四”时期）的政治性质的斗争。当北洋军阀横暴地压迫《新青年》的作者和读者的时候，后期《新青年》由共产党人直接主持，第一篇发表的就是瞿秋白所译的《国际歌》，而性质也全是政治的了。同样在文学领域，承继和发扬了《新青年》的反对旧文学与建设新文学的传统的，是也成立于1921年的文学研究会。这时对新文学的意义更明确了，强调时代与环境对于作家的影响，强调文学之为人生及改造人生的意义。1922年《创造季刊》的出版，基本性质也是暴露与反抗现实人生的。以后经过了五卅、大革命到1927年革命阵营的分化，在文学领域里也有同样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说从1919年到1927年是第一个时期。从政治情势上或文学理论上固然可以说明是如此，从作家与作品的表现和主要倾向上看也是如此。

第二时期是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相当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第三时期。在文学领域，经过了1928年至1929年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30年3月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了。在左联的工作下，已提出了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已在文学界占有绝对优势的领导地位。虽然在今天看来，当时的工作仍有不够或值得批判的地方，但那时确是在文化围剿之中战斗过来并发生了广泛影响的。到了末期，因为新形势的到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又对宗派主义与关门主义作了清算，1936年春自动将左联组织解散了，努力团结一切有爱国意识与民族思想的作家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左联的组织形式虽然从成立到解散只有六年，但这十年期间整个可以说是由左联来领导的；无论从文学理论或创作来说，都是如此，其中最杰出的领导者便是鲁迅。

第三时期是1937年到1942年的五年。即从抗战开始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抗战期间前五年的文学。从1936年的西安事变起，在全国广大人民的抗日要求的压力下，这时停止了内战，取得了一般的国内和平；1937年起便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国共两党又有了某种形式的合作，而在文学领域，团结的工作也有了一定的成就，组织成了以进步作家为骨干的，包括所有赞成抗日的作家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由文协的组织发动了广泛的文艺力量来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发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使过去一些比较落后的作家也开始接触了现实，受到进步文学思想的领导；一些在大都市住惯的作者也开始和农民兵士有了初步的接近。但就文学的中心领导思想说，则较之左联时期比较退守了；批评的工作在强调团结的影响下没有很好地展开，作品中的思想性一般也不是很高。但是作家们为抗日服务的激越情绪是有的，也有了一些通俗形式的作品；一般的是以歌颂抗战促成团结为作品主要内容的。这时期作家们的情绪很高，而且活动普遍到各个地方区域，文艺运动是相当发展的。

第四时期是1942年到1949年的七年。即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的时期。我们不以抗战八年为一期，而

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分期的界线，就因为这讲话实在太重要了；解决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许多问题，使文学运动和作家的实践都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而且历史证明了这讲话的正确性，我们已有了好多优秀的善于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家和作品。这是新文学发展的方向问题，也是由左联提倡大众化以来，进步作家们努力企图解决而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这是新文学建设上的关键，只有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得到解决，新文学才有可能走上健全发展的大道。但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下，在抗日根据地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的条件下，这问题不只在思想上弄明确了，而且立刻使作家们开始了实践；从工作实践与创作实践中具体地体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确，使文艺工作者与文艺的面貌较之过去有了根本的改变。到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基本结束时召开的全国规模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时为止，仅收到《人民文艺丛书》中的优秀作品就有177种，这些都是实践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以后的作品，都是用新的语言形式写出的新的主题和新的人物；这些作品充分证明了“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的正确。

不只解放区的作品自然地以1942年划分界线最合适，国统区的作品也是如此。一切有民族意识和希望抗战胜利的作家都对国民党感到了失望与痛恨，不再寄托任何的希望，因此表现在作品中的题材和主题的基本倾向也与抗战初期大不相同了。歌颂抗战进步的作品减少了，多的是暴露国统区黑暗统治和争取民主自由的作品；一些比较落后的作家苦闷了，而大多数的进步作家则自然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人民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经常秘密而又普遍地流传于国统区，新的文艺方向大大鼓舞了作家们追求进步与光明的意向，因而也出现了许多思想性很强的作品。党的领导自来是有全国意义和全国影响的，绝不仅局限于已解放的地区。虽然国统区的作家们遭受着统治者的压迫，没有直接与工农结合的方便和条件，但群众的民主运动也经常地用文艺作品和文艺的形式作为武器，作家们并不是没有战斗的任务和岗位的。这种情况在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期间，基本上也还是没有大的改变；在反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各种运动中，文艺工作者都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因此这七年中基本上是新文学获得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直接领导的时期，“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这一时期文学的活动方向是遵循着这一原则的。

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是在中国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时候在人民的首都北京举行的。这样空前的大会表示着人民对于文艺的重视和需要，表示着全国文艺工作者的团结和会师，也表示着此后将又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次大会不只产生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组织，而且分别部门成立了文学、戏剧、电影等工作者的协会；以后各地方也陆续召开了文代大会，产生了地方组织。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从此有组织地团结起来了，而且自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政务院中也设立了领导全国文艺工作的文化部，文学的方向与活动都明确而有计划性了，作家们又自觉努力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于新中国建设中的文艺工作，文艺工作者一定会有辉煌的贡献。大会闭幕后各方面的实践，取得了丰富的收获。无论就群众文艺的展开、旧艺人的改造、普及工作或创作的成绩说，都说明了文艺工作者是努

力担负人民赋予他们的任务的。中国的新文学史由“五四”到文代大会恰好三十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后将另起一个新时期，将会有其更灿烂丰硕的果实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年修订版）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一个十年：1917 年—1927 年。1915 年 9 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第二卷起，易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即以此为肇始。特别是 1917 年迁京后，《新青年》集结了一批推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人物，并且在 1919 年借“五四”运动的大势，将整个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文学革命发动后，很快便形成规模和声势，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取得重大的实绩。首先是白话文的全面推广。第二，是外国文学思潮的广泛涌入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呈现出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思想大解放的局面。第三，是文学理论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第四，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实绩。文学革命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而彻底的文学革新运动，不同于历史上包括近代产生过的文学变革或文学改良，它所带来的是文学观、内容形式各方面全方位的大革新、大解放。……新文学社团的纷纷建立，标示着新文学运动已从初期少数先驱者侧重破坏旧文学，而转向大批文学生力军致力建设新文学了。在众多的新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也最有代表性。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17 年 1 月到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是文学革命初期……实际上这是一个准备阶段。“五四”到 1926 年“三·一八”惨案，这一段思想最解放，创作也最活跃。……“三·一八”惨案到 1927 年“四·一二”事变，革命形势急剧发展变化，许多新文学作家投身到南方革命阵营和北伐战争中，创作一度沉寂，但这一时期开始的对于“革命文学”的理论提倡和创作的最初试验，都为下一时期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也可以发现某些共同的文学兴趣与归趋：一是理性精神的显现。二是感伤情调的流行。三是个性化的追求。四是多样创作方法的尝试。……到了第一个十年的后期，一般新文学作者在进行了各种创作方法的尝试之后，逐渐都转向现实主义。这种转变，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收获更大一些。如偏于客观写实的乡土小说的兴起，作品表现的角度从个人圈子转向社会底层，从提问题或重抒情转向人物形象的刻画，艺术上显然更加成熟了。诗歌的发展路向比较复杂。第一个十年中期出现的新月派对诗歌艺术美和形式美的强调，后期蒋光慈等人关于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提倡，以及李金发等人象征派诗歌的理论提倡与艺术试验，都预示着在第二个十年诗歌艺术将有一个更加多元的发展。

第二个十年：1928 年—1937 年 6 月。现代文学在结束了“第一个十年”之后，经过仅一年的思想的酝酿准备，队伍的重新组合，又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通常称之为“第二个十年”。这个时期显著的特征有三：其一是“五四”所开启的有相对思想自由的氛围消失了，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得空前的政治化；二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初步的运用，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此后二三十年间的面貌；三是在左翼文学兴发的同时，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及其他多种倾向文学彼此颉颃互竞，共同丰富着 30 年代的文学创作。……30 年代文艺思想领域呈现出极为活跃的状态：第一个十年里纷纷传入中国的各种文艺思潮经过历史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